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 印度洋错误认知之刍议

陈新丽* 冯传禄** 罗国祥***

【内容提要】 日益崛起的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印度洋存在不仅是中国自身的一个新兴战略关切,也不可避免地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有视角各异的许多解读。基于不当逻辑、错误立场和复杂心理,国外研究者很容易对中国“西进”印度洋形成乃至故意渲染相关“错误知觉”。但中国“西进”印度洋并不是基于“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权力投射和地缘扩张,所谓“珍珠链”战略也并非中国的印度洋战略,不可将“马歇尔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也不应将中印关系锁定在“安全困境”的悲观预期中。中国经略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不乏区域贡献和国际意义。

【关键词】 中国印度洋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社会 错误知觉

DOI:10.16608/j.cnki.nyj.2016.02.04

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从分析中国国际战略到观察中国大国作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有许多视角各异、不同侧重的分析解读。然而国际政治中的相关“知觉”难免也有可能成为“错误知觉”。一些国外研究者出于特定立场很容易对“中国经略印度洋”形成乃至故意渲染相关“错误知觉”,而这些“错误知觉”的传播对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以及国家利益维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消极影响。目前,国际政治中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错误知觉”

*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

**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集中于三个主题:一是对中国印度洋战略的相关臆测和诋毁;二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疑虑和相关曲解;三是对中印关系的悲观预期和错误舆论引导。当然,国际政治中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错误知觉”并非泾渭分明可截然分开,而是有紧密交织。在笔者看来,在诸如中国为什么进入印度洋、怎样去经略印度洋这些问题上,不仅我们自己需要有清醒的理解和准确的定位,也更需向国际社会传达出清晰的信号,对国际政治中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种种曲解和误解更有必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一、“错误知觉”的相关表征

表征(representation)一词,作为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一个重要术语,是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是外部事物在心理活动中的内部再现。国际政治中的相关主体基于不当逻辑、错误立场和复杂心理,其对华“知觉”难免有可能是“错误知觉”。

第一,对中国印度洋战略的相关臆测和诋毁。2015年6月,印度地缘战略家、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研究教授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一篇文章中,将2015年5月22日中国“元级”潜艇通过阿拉伯海出现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以及2014年秋两艘中国潜艇停靠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描述为“过去600年里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最远的部署”,强调中国在印度洋有“日益增长的兴趣”,并联系到“中国在南海与东海表明其领土主张的自信方式”,进一步断定“中国想以自己的联盟和多边机构成为领导者,而不是在美国全球治理的体系结构中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建设海军力量的真正目的是在于为了在争议地区声索主权和在遥远大陆投射力量;决心以海洋路线获取全球权势,并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国看上去正在塑造自身在印度洋这一世界的新地缘政治重心的战略角色。”^①

事实上,中国“以海洋路线获取全球权势”也并非新鲜提法。自2005年在一份名为《亚洲的能源未来》的美国国防部内部报告中“珍珠链战略”被首次提出后,十年间频频出现于国际政治中而成为热门词汇,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国家以及印度、日本等国相关媒体、学者、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印度

^① Brahma Chellaney, “Chin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The Japan Times*, June 23, 2015.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6/23/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chinas-indian-ocean-strategy/>
#.VdoBpvmepgh

洋战略的一个特定称谓。他们认为,中国在从南中国海出发至西亚非洲的海上沿途,正在着手打造自己的战略关系网络。中国不仅加强了自身的海洋设施建设,还积极参与或资助相关国家的港口、机场和后勤保障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在民商用途掩护下兼备军事功能,具有后勤供给、电子监听和军事停靠的用途。根据他们的判断,通过打造并串联一颗颗“珍珠”,中国海上力量可以实现在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的突破而推进到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拉伯海;而中国的这一运作,不仅可提高中国海上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系数,在具有防御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具备进攻性特点。^①由此可见,“珍珠链”之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基于印度洋海上路线构建相关战略支点以谋求力量投射。

然而,中国地处亚太而远离印度洋,此前中国海洋战略的关注一直相对集中于太平洋方向,而中国地缘战略也始终以亚太为重心。鉴于周边安全态势以及自身力量局限需要战略集中,一直以来中国海洋方向的战略重心集中于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西太平洋中国近海区域。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其本身有内在的必然性,在相应的历史时期也有充分的合理性。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从未发布成文的印度洋战略。多年来,中国秉承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维,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主动避免对外树敌,始终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考虑。而且,中国政府也致力于推动中印关系发展和增进中印互信。鉴于印度的战略疑虑,时任中国国防部部长的梁光烈在2012年9月访问印度时公开强调,“作为中国国防部长,我借此机会再度澄清,解放军从未在巴控克什米尔部署一兵一卒,……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未在海外建立过军事基地,也不考虑在印度洋这么做。”^②但中国的谨慎态度并未足以消除国际社会的猜疑和误解。此前,中国的“韬光养晦”在国际政治语境中被理解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③(隐敛锋芒,伺机而动),而当前中国在印度洋日益积极进取和奋发有为,于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臆

^① Brahma Chellaney, “China Covets a Pearl Necklace: Dragon’s Foothold in Gwadar,” April 6, 2007, <http://chellaney.net/2007/04/06/china-covets-a-pearl-necklace/>; David Scott, “India’s Drive for a ‘Blue Water’ Navy,”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0, No. 2, Winter 2007 – 2008, pp. 1 – 42.

^② 《梁光烈:解放军无意在印度洋建军事基地》,新华网,2012年9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05/c_123672646.htm

^③ 李少军:《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第13页。

测、被误读乃至被污蔑的标靶。

第二,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疑虑和相关曲解。自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立刻别有用心地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二战后一举奠定美国对欧洲长期优势地位的“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以“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来诠释“一带一路”倡议,并指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是其中一举多得的重点战略措施。^① 美中政策基金会学者香农·蒂耶齐(Shannon Tiezzi)就声称,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而北京投注两条丝绸之路可以达到同样目的,中国借此“西进”有着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图谋。^②

当然,国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并不限于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具象化。比如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令中国沮丧,中国显然并不甘愿被排斥于这一自由贸易区之外,但显然也不想去满足缔结该协定的要求,于是“一带一路”正好也构成了替代TPP的中国方案。^③ 而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看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雄心勃勃,正在以“中国的地区行动主义”来塑造一种“去美国化”的亚洲新秩序,而推动亚洲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建设、设立亚投行、组织亚信峰会、提供丝路基金、强化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相关行动,都有利于中国对地区机制加强主导。^④ 还有观点认为,“2013年后,中俄之间的一系列双边事态如密切高层互访、显著强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签署天然气供应重大协定等,显示中俄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强战略合作,摒弃分歧,构建事实上的‘准同盟’和‘新的反美轴心’。”^⑤ 更有美国学者指出,“在东亚地区和太平洋海域,中美之间越

^① “China’s ‘Marshall Plan’: Xi Jinping Bids to Take Leadership away from the U. 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2014.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chinas-marshall-plan-1415750828>

^② Shannon Tiezzi, “The New Silk Road: 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Diplomat*, November 6,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11/the-new-silk-road-chinas-marshall-plan/>

^③ David Cohen, “China Pushes ‘Silk Road’ Regional Trade on Two Fronts,” *China Brief*, Vol. 13, No. 20, October 10, 2013, pp. 1-3.

^④ Matthew Goodman and Ely Ratner, “China Scores a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Nex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3,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384/matthew-goodman-and-ely-ratner/china-scores>

^⑤ Leslie H. Gelb and Dimitri K. Simes, “A New Anti-American Axis?”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07/opinion/sunday/a-new-anti-american-axis.html?>

发具备冲突和零和博弈的性质。”^① 因此,“一带一路”也被视为中国版“再平衡”战略,而且“一带一路”还被视为一项巧妙的“再平衡”——“从表面看来,‘一带一路’只是有深远影响的经济上的发展计划,旨在加强该区域内的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联通性,但实际上该倡议的真实目的在于安全问题,只不过中国十分巧妙地借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淡化了地缘政治含义上的敏感性。”^②

然而,正如有中国学者所分析的,尽管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确有一定“经济共性”,但两者却有着本质区别。“‘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以务实合作为主要导向,而‘马歇尔计划’服务于美国的对苏冷战战略,是一项具有附加条件的援助。”^③ 而诸如“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论、中国“新怀柔政策”论等,显然也是美国学者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来观察所能够找到的对“一带一路”中小国家“富有启示”的“善意提醒”。相关国家借助炒作中国“经济权势扩张”、“战略再平衡”、“怀柔政策”以及“自我救赎”相关卖点,故意漠视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塑造互联互通的区域环境以及和谐和平国际环境的真实愿望,人为淡化中国真金白银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援助,以及在民生发展方面对沿线区域确实有效的贡献。

即便不否认美国学者对于“一带一路”相关认知中也包含有一些理性思维和中肯判断,但其多数认知和主张都是从维护美国霸权目的出发,立足于将中国界定为战略对手或挑战者的不当立场,其中还夹杂酸涩、嫉妒乃至作梗使坏心理。这些言论的出现和传播,即使称不上是美国政府的“阴谋论”,而更多会被视为学界自由发表的学术观念,但也同样具有弱化中国影响力、丑化中国国际形象甚至抹黑“一带一路”的功效。

第三,对中印关系的悲观预期和错误舆论引导。中国和印度共处亚洲,山水相接,一“龙”一“象”,同为世界大国又互为周边强邻。基于“强邻必是对手”的陈腐思维模式,有些媒体唱衰中印两国关系的声浪一直不绝于耳。

^① Yun Sun, “March West: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 S. Rebalancing,” Brookings, January 31,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1/31-china-us-sun>

^② Zheng Wang, “China’s Alternative Diplomacy,” *The Diplomat*, January 30,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chinas-alternative-diplomacy/>

^③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8~109页。

甚至十多年前,自印度经济开始复兴之际便有国际评论认为,鉴于“历史积怨和现代嫉妒”,中印天然构成竞争对手,而绝难成为合作伙伴。2005年3月发表于英国《经济学家》的题为《对手与伙伴》的评论列举了三个支持理由:一是“印度对中国的疑虑根深蒂固”,双方距达成解决领土争端的方案“还很遥远”;二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会使中印关系复杂化”,中国在对印度进行“战略包围”;三是“印度和中国也许会发现两国正在争夺资源,特别是能源”。^① 目前看来,多年后这些理由依然还能在国际政治中引起共鸣。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一些观察家、战略家也经常将中印关系锁定在“安全困境”的悲观预期之内。

约瑟夫·奈在2011年年初曾撰文指出,印度不仅不会成为中国的盟友,事实上它反而有更大可能被视为平衡中国战略崛起的一个亚洲国家。^② 印度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汉在2012年也撰文指出,中印之间的争夺已经从以边界纠纷为中心转移到了以海洋控制为中心,并向人们生动呈现了中印两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升级的“安全困境”。^③ 拉贾·莫汉文章中所披露的相关材料,也揭示出印度洋战略界对中国持有根深蒂固的战略防范和疑虑心理。

众所周知,印度洋被印度人视为自家后院。远在1945年,印度海权思想奠基者潘尼迦(K. M. Pannikar)就指出,印度国家前途不取决于陆地边境,而取决于三面环绕自身的浩瀚印度洋,并提出“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④ 因此,印度对域外力量进入印度洋保持戒备之心并不为奇。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进入印度洋势必会为中国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国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的相关挑战时面临双向受压的风险。显然,美国和日本等国乐于看到这种局面,因此不遗余力地积极宣扬中印“安全困境”和“中国威胁论”,以便错误引导国际舆论和挑动印度反华势力。中国学者王嵎生就指出,他们“感兴趣的是以冷战思维为‘透视镜’,以挑拨离间为‘法宝’,把中印关系引向‘对抗’,印度

① 张立:《中印关系前景可期:合作甚于冲突》,《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第86页。

② [美] 约瑟夫·奈:《中印关系前途未卜》,载《联合早报》,2011年1月14日。

③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012.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amudra_Manthan_Brief1.pdf

④ [印度] 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的历史影响》(得陇、望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

只要同美日进行联合军演,那就是‘矛头指向中国’;印度发展导弹,那就是为了‘威慑和覆盖全中国’。”^①在此背景下,对中印关系的悲观预期和错误舆论引导变得既“环环相扣”又“相辅相成”了。

二、“错误知觉”的现实背景

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经略印度洋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相关对华疑虑和曲解仍在不断发酵,并有弥散之态和推陈出新之势。目前,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正被热炒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版“再平衡”战略、“中国经济自我救赎”和中国“新怀柔政策”,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被解读为“新包装下的珍珠链战略”等。当前,相关“错误知觉”不断弥散和出新,其中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

第一,鉴于印度洋地区对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特殊地缘战略意义,全球诸多重要战略体正纷纷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纵横捭阖。印度洋凭借不可替代的地理联通性、富甲全球的资源禀赋以及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版图、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博弈舞台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与此同时,其域内大国的强势崛起和域外大国的竞争,与地区间文明冲突、资源纷争和恐怖主义等相交织,使得印度洋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构成了21世纪全球力量格局调整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如美国学者卡普兰的《21世纪的中心舞台:印度洋上的权力角逐》^②和《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③以及印度学者拉贾·莫汉^④的《中印海洋大战略》^⑤等论著被广泛关注,“印太”概念日益勃兴,印度洋构成了21世纪大国竞争的中心舞台的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而

^① 王嵎生:《谁在挑拨中印关系》,载《解放日报》,2012年10月19日。

^② See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 2009, pp. 16–32.

^③ See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 188–199.

^④ 在《中印海洋大战略》中,译者将原著作者 C. Raja Mohan 译为雷嘉·莫汉,即本文中的拉贾·莫汉,特此说明。

^⑤ 参见[印度]雷嘉·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朱宪超、张玉梅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且也不难发现,现在全球诸多重要战略体正在印度洋地区纵横捭阖以谋求相关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守成大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地缘战略视野里,印度洋战略价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重要性与日俱增。有中国学者指出,当前域外大国以谋篇布局姿态纷纷强化与区域国家的联系,这体现出世界对印度洋地区特别是对相关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增长现实及前景的承认和尊重,也意味着印度洋区域的域外联结性和影响力在快速提升。^①

第二,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呈现出前瞻性战略意识和全球性战略视野。今日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比近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近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尤其更需要关于区域战略、海洋战略的深入研究和前沿探索。中国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整合亚欧大陆和印太两洋,支撑自身崛起并促进区域及跨区域共同发展。较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度的“东向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野更加广阔,意蕴更为高远,也更符合国际法理和道义,并顺应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潮流。在“一带一路”倡议已上升到中国对外大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无法忽视印度洋区域而单纯地从东亚视角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自身的未来。近年来,从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联合护航常态化到中国企业积极强化同环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再到中国政府倡议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以致力于同沿线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印度洋方向已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未来的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无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日益深入印度洋已是客观事实,未来中国进一步悉心经略印度洋几乎也是确定的趋势。中国为何要深入印度洋以及中国将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又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国际战略和大国作为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和绝佳窗口。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动因、路径、策略以及相关影响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学者格外关注的焦点议题。

但是,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也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

^① 叶海林:《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战略态势评析》,载汪戎主编:《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4:印度洋地区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因此,在中国和外界之间,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局势已现端倪。

第三,中国进入印度洋不可避免地会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这势必造成一定冲击。在单元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全球层面,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均面临着现实困难。

考察当今国际体系,新兴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使得既有权力结构出现新变化,特别是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以及重大国际事务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乃至推动者。纵观当代参与印度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行为体,中国显然是后来者,但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战略主体。中国进入印度洋不可避免地会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产生影响。其结果是,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都对其他行为体产生一定冲击。与此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带来了现实困难。

尽管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但整个世界的空间距离仍然存在。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国家之间、地区维度以及全球层面有所突破,并层层展开。然而在单元层面,以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对华认知为例,中美、中印首先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存在一些固有的价值观鸿沟,在全球化进程中三者的利益扩张、政治和经济诉求也互有诸多竞争性重合。汉斯·摩根索指出,现实主义的确相信利益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的唯一永存的标准。^① 亚历山大·温特也认为,没有人否认国家行为的动机是认识到的国家利益。^② 毫无疑问,国家利益是现实中影响一个国家如何认知和界定他国行为的核心因素,而国家价值观是现实中影响国家间相互认同或否定的核心变量。倘若无法有效平衡三者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或是无法逾越中美或中印的价值观的鸿沟,美国和印度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或将很难改变。所以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在大国层面,中国需要积极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以便求同存异。

此外,在以英语语言为主流载体的国际话语权上,中国整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即便进入了21世纪,但从信息流量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流向非西方国家的信息量是该反向流量的近100倍;全球2/3的信息来自于只占世界

^①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人口1/7的西方发达国家;每天全球传播的国际新闻有80%来自于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社)。”^①可见,在地区维度以及全球层面,倘若无法建构起话语权上的大致平等,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将有较大障碍。那么,在话语权弱势无法很快改变的背景下,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需要更积极有为,并主要以自我贡献来改变地区的认知和世界的声音。

三、“错误知觉”之逻辑解读

当前国际政治中,相关国家或将中国向西开放的发展战略解读为“国强必霸”地缘政治逻辑下的西向扩张,或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相关国家的港口、机场等民用、商用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解读为打造“珍珠链”,或将“一带一路”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歇尔计划”和中国版“再平衡”战略,或将中国的海权发展和相关印度洋行动解读为谋求印度洋相关海域的制海权,或将中国倡导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理解为构建集团包围或联盟对抗等。固然,此类“错误知觉”出现有一定的客观现实背景,但是此类“错误知觉”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反映,其认知结果更主要地还与战略主体主观因素方面的认知逻辑、认知立场以及认知心理密不可分。

这些“错误知觉”揭示出相关主体的对华思维依旧深受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经典海权理论、冷战思维以及进攻型现实主义等影响,对华立场依旧具有比较浓厚的防范和牵制的一面,对华心理上表现出酸涩、嫉妒和疑虑并期望利用又暗中使坏的复杂心态。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对中国对区域和跨区域的实际贡献故意视而不见,却极力宣扬中国作为一个印度洋地区后来者所带来的所谓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例如,几年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学者卡普兰将中国进入印度洋描述为纵向扩张(印度为横向扩张)^②,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和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R. Holmes)则强调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雄心和软实力投射。^③在他们的解读之下,“实力投射”、“资源掠夺”和“市

^① 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②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p. 17.

^③ Toshi Yoshihara, “China’s ‘Soft’ Naval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Pacific Focus*, Vol. 25, No. 1, April 2010, pp. 59 – 88; James R. Holmes, Andrew C. 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44 – 149.

场占领”等成为中国进入印度洋的动因,“国强必霸”、“势力扩张”则成为他们所理解和宣扬的中国进入以及经略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他们强调,中国主要是因为实力因素变化以及快速崛起而带来的国际地位变化,使得自身战略目标和相关战略行为发生变化,并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和利益追求必然在印度洋上对印度的安全和发展构成挑战,对美国的海洋霸权和战略利益带来威胁,给地区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影响。

这些学者论述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战略企图、战略能力、战略部署所展示的相关逻辑中,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是中国的既定目标,而国家崛起需要国家利益不断增长来支撑。中国若希望国家利益不断增长来支持大国崛起,显然就需要也必然会不断改变现状,而现在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以实力上升为基础,为获取更多、更大的战略利益,中国就有了改变现状和权势扩张的冲动。因此,实力增强后的中国进入印度洋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为了确保国家利益的稳定获得,中国需要能为战略行动提供便利同时有助于扩大自身影响力辐射的战略支点,也需要增强海军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于是,对于一些战略学者而言,中国积极打造印度洋上的战略支点以及谋求一定制海权,或者说中国推进“珍珠链”战略,看上去似乎确凿无疑,抑或必须宁愿信其有。可见,即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许多国外分析家事实上往往依然固守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遵循以往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认为实力增强后的中国进入印度洋不可避免,并热衷于强调“国强必霸”逻辑,积极渲染中国在印度洋势力拓展和经济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基于“国强必霸”逻辑对中国在印度洋“势力扩张”的这类解读,与国外学者研判中国其他方面战略问题时出于特定立场并往往强调由实力变化而带来战略企图和战略行为变化的分析,是异曲同工并一脉相承的。当然,吉原恒淑和詹姆斯·霍尔姆斯等学者也认为,鉴于客观现实,中国当前权势扩张更多是依赖“软实力”投射和经济手段扩张。^① 不过,一些印度战略学者,相对来说现在则对中国海上力量迅猛发展和行动半径扩大更为忧虑。拉贾·莫汉在《中印海洋大战略》中的分析尽管相对客观中立,但其论述更多地向人们生动呈现了中印两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升级的安全困境,^②库马

^① See Toshi Yoshihara, “China’s ‘Soft’ Naval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pp. 59 – 88; James R. Holmes, Andrew C. 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Indian Naval Strateg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p. 144 – 149.

^② 参见 [印] 雷嘉·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朱宪超、张玉梅译)。

尔则毫不讳言中国在印度洋扩张对地区稳定带来的冲击。^①然而“国强必霸”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揣度中国,“实力上升”和“改变现状冲动”并不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合理注解,“围堵印度”、“挑战美国”、“损害地区利益”之说是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意图的恶意曲解。

首先,“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于揣测中国,因为它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战略理念以及战略传统。从中国现实需求来看,维护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从而为中国整体发展服务乃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深入印度洋并主动将美国或印度定位为敌手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战略理念上,中国外交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当今中国领导人更是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在发展理念上始终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再从中国同印度洋地区的历史联系看,哪怕在中国海上实力无可匹敌的历史时期,中国也并无“国强必霸”的武力扩张传统,反而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进行和平与和谐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基于力量上升而扩张的“炮舰政策”只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传统,并一直为中国所谴责。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也正是如此。

其次,中国国家整体实力提升,特别是远洋战略能力以及全球经济能力的提升,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但是中国实力提升和战略能力增强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与和平崛起路径设计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积极进取的姿态或许确实显示出中国对印度洋战略意义和自身作用的认知变化,但21世纪中国经略印度洋,既不像美国那样有确定的控制战略要塞的具体目标,也不同于印度怀有的“让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的雄心。尽管有维护自身在印度洋的安全需要,然而中国一直对在海外驻军以及在印度洋设立相关军事基地持保守立场。可见,中国经略印度洋并不在于在印度洋获取排他性的制海权,也无意于在印度洋地区争霸,更不是要遏制印度发展或挑战美国霸权。事实上,中国当前也没有能力遏制印度或挑战美国。影响一个国家战略规划和战略行为的因素,显然不仅限于国家战略能力,而战略能力增强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战略取向发生变化。事实上,对中国而言,战略能力增强反而为中国和平、合作的战略取向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① Kamlesh Kumar Agnihotri,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vy, its Strategic Expansion into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Likely Impact on the Regional Stability,” *Maritime Affairs*, Vol. 7, No. 1, Summer 2011, pp. 48 - 64.

再次,就战略而言,尽管战略是针对对手的整体安排和全局部署,但战略也并非都是攻势战略,战略也可以是守势战略。当然,战略守势并不排斥积极的战略防御。如果“围堵印度”、“挑战美国”成立的话,就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对抗性的攻势战略,但中国并不是为了挑战某一势力而咄咄逼人地进入印度洋。就中国整体战略态势而言,即便现在中国有着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一系列战略设计和具体行动,但依然并不代表中国选择了战略攻势,而顶多只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防御态势。中国之变化的本质在于,过去是相关问题发生后中国被动进入,而现在中国在印度洋寻求更多主动性和事前预防性。但战略主动和战略攻势显然是不同概念,战略上的积极进取姿态并不改变守势战略本质。退一步讲,即便在战术上选择进攻,也并不代表战略上选择攻势。

最后,强调广交朋友而不是多树敌始终是中国战略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思想,其核心考虑之一就是告诫中国不要多树敌。现在中国积极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命运共同体理念,事实上都反映出“以和为贵”和“共同发展”的战略思维。其实,尽管中国进入印度洋根本上是为自身国家利益所驱动,但显而易见,中国是以和平和合作的参与者姿态出现的,同时中国因素对于印度洋地区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强大驱动和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与其说印度洋已成为中国力量全球扩展的一块主要跳板,不如说中国经略印度洋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也必然更加惠及周边地区。

结 语

日益崛起的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如何在印度洋存在,并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一个新兴战略关切,它也超出中国自身关切的范围而具有了区域意义乃至世界意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印度洋地区国家以及世界主要战略体所瞩目,甚至不可避免地遭受一些故意诋毁。

事实上,在21世纪中国经略印度洋不仅符合自身当前以及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将为印度洋相关地区和国家带来发展机遇,构成促进印度洋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源性驱动力量。同时,随着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经济纽带和人文联系的不断强化,对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也有望产生功能

性外溢。如果从更大的视野看,当今中国在印度洋积极进取的战略姿态转变,深嵌于中国崛起、国际政治经济重心转移以及国际权力结构变革背景中,不仅对中国发展和崛起进程有特殊贡献,并将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国际权力结构变革。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驶入“那没黎洋”(即印度洋)^①,而今天中国经略印度洋注定不会只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重演,势必会超越“郑和下西洋”的国际贡献。因此,美国和印度等国的相关学者都需要抛弃地缘政治思维中的陈旧逻辑,改变防范与遏制中国的不当立场,纠正面对中国时的病态心理。

对此类“错误知觉”,中国需要有应对策略。简单而言,有以下几点。其一,对外传播内容不能简单以中国“国家利益和良愿”来解释“中国战略”。其二,对外传播路径需要在单元、地区和全球层面多维度铺开,并各有重点突破口。其三,及时规划并适时清晰宣示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毫不隐晦地表达本国意志,这或将有助于避免引起国家间或地区层面的猜测和歧义。其四,有力而坦然地阐释“一带一路”对于中国的安全意义和战略意义而不是仅仅强调经济上合作共赢,这或有助于充分展示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的自信并向相关方表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维护国家权利和安全利益的战略底线。概括地说,有效的对外传播不能简单以“中国善良”或“中国需要”来解释“中国战略”,不能只讲“合作共赢”而不谈“战略底线”。

(编辑 吴兆礼)

^① 万明:《郑和七下印度洋——马欢笔下的“那没黎洋”》,《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79页。